

智能与技术，当为文明共生的方舟

写作手记



如今，我们站在文明史的奇点时刻，目睹智能技术从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演变为重塑地球的洪荒之力。但这种力量的全球分配不均与治理话语权失衡，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殖民阴影下的生存困境与突围诉求。

当智能技术在西方主导的叙事中成为“普世进步”的象征，却也在全球南方制造了新的创伤，让人感受到“秩序失序”的切肤之痛。这种痛感催生了《智能世界的秩序》的写作——它不仅是一部著作，更是对智能时代人类文明存续方式的系统性叩问，试图在“技术霸权”与“发展权”的张力中，重建多元共生的治理坐标系。

■ 刘志毅

以全球南方为罗盘的思想远航

写作《智能世界的秩序》的历程，恰如一场以全球南方为罗盘的思想远航，其骨架并非预设的学术架构，而是在目睹智能技术重塑世界的洪流中逐渐清晰的认知地图——它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迷思”为起点，在“直面技术资本主义的病灶”中深化批判，于全球南方的觉醒与突围中汲取力量，最终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愿景。这条脉络的核心，是将全球南方从“技术试验场”与“数据原料地”的边缘位置，推向重构智能文明坐标系的中心舞台。

从后记的回望看，这个骨架的搭建始于对“秩序失序”的切肤之痛：当跨国科技巨头以“效率”之名将发展中国家拖入“数字牢笼”时，当算法侵蚀民主根基而现有治理框架束手无策时，我意识到智能时代的秩序重构不能延续西方中心的“普世叙事”，而必须以全球南方的“发展权优先”为原则。于是，思考的路径从解构“技术普世主义”的虚妄开始，剖析工业时代治理范式强加于智能文明的错位；进而深入资本与技术合谋的病灶，揭示霸权至上逻辑对公平与正义的吞噬；最终在肯尼亚农民用太阳能驱动的AI终端对抗饥饿、东南亚工人在数字技能培训中重获尊严的实践中，看见

■ 冯闻文

18世纪，库克船长为寻找南方大陆，曾三次深入南大洋，最南抵达南纬71°10'海域，他的探索成为人类认识南端的开端。捕鲸活动是早期南极探险的重要推动力。1821年2月7日，美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登上南极半岛西北海岸，被公认为人类首次登陆南极大陆。此后，各国纷纷向南极洲派遣探险队：美国在1839年发现威尔克斯地，法国在1840年发现阿德雷地，英国则在1841年发现罗斯海。进入20世纪初，人类开始深入南极大陆、踏足南极高原。1911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终于抵达了南极点。

环境史学者吉伦·达西·伍德所著《极地竞赛：19世纪南极开发史》（以下简称《极地竞赛》）一书，正是围绕1839—1841年的英法美南极探险展开叙述。

这本书的中心角色是南极洲。法国人迪蒙·迪维尔、英国人詹姆斯·罗斯、美国人查尔斯·威尔克斯，这些带领探险队的人物并非故事的主角，作者也没有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作者认为，与大陆漂移、气候变迁这样宏大的自然运动相比，人类的英雄主义微不足道。他们被时代选中，承担起为国家在南极竞赛中争胜的角色，却

全球南方以“能力建设共同体”突围的可能。这个骨架的每一环，都浸透着对“多元文明共生”的信念——智能技术不应是单一霸权的工具，而应成为承载不同文明智慧的方舟，全球南方正是校准这艘方舟航向的星辰。

秩序是文明共同参与的交响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终结争议的答案，而在于刺破笼罩智能时代的思维迷雾，其思想锋芒集中体现为三次认知跃迁。这些跃迁并非书斋里的逻辑推演，而是田野调查中与全球南方共呼吸的产物。

第一次跃迁是对“数字殖民”的当代解构与“数字发展权”的提出。当目睹某社交平台通过“数据虹吸效应”，诱导缅甸农民大规模种植单一经济作物，进而引发生态灾难；西方企业以“技术援助”之名，行城市规划干预之实，我意识到数字殖民的本质已从19世纪的矿产掠夺进化为“数据一认知”的螺旋控制。这一发现打破了“技术中性”的神话，为“技术正义”找到了新支点——全球南方不仅要数据主权，更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权利。

第二次跃迁是重构人机关系的哲学基础，并提出“共生进化论”。面对“AI取代人类”的恐慌，我从深圳市龙岗区电子厂工人与AI协作提升效率的实践中领悟到，人类与机器的关系，不该是替代与被替代的零和博弈，而应如DNA双螺旋般协

同进化。将创造性工作、情感交互留给人类，让AI解放重复劳动——这不是能力的妥协，而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守护，因为全球南方的智慧从来不是“效率至上”，而是“以人为本”的韧性生长。

第三次跃迁是预见技术奇点的治理预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为可操作的框架。当量子计算逼近、AI自主进化风险隐现时，我从“曼哈顿计划”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提出“技术奇点熔断机制”与“全球AI观测站”构想。这一预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赋予全球南方在治理中的“一票否决权”，确保技术奇点不被单一霸权裹挟。秩序的重构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所有文明共同参与的交响。

这些思想锋芒的共同指向，是让全球南方的声音不再淹没在“普世技术”的喧嚣中，而是成为重构智能文明秩序的主旋律。它们或许稚嫩，却承载着最朴素的愿望：愿智能技术如阳光普照每个角落，而非如阴影遮蔽多元文明的天空。

多元文明共生的活态样本

写作《智能世界的秩序》的过程，是一场以全球南方田野为课堂的思想苦旅，所见所闻折射为认知的裂变与升华，最终沉淀为对“科技人文主义”的深刻洞见。

面对“技术乐观主义陷阱”，初稿曾陷入“效率至上”的迷思，直到我在东南亚工厂目睹被机械臂取代的工人蜷缩于角落的沉默身影，才惊觉智能技术的

光环下藏着被遗忘的脆弱者。这促使我重写核心章节，将“技术性失业补偿基金”方案嵌入理论框架，主张从AI企业超额利润中提取转型保障金，更以“技能转型优先于技术替代”的观察，取代对“进步”的盲目礼赞。正如一位印尼纺织女工所言：“机器能织布，却织不出我们孩子的学费。”真正的科技人文关怀，从来不是赞美技术的伟力，而是守护每个具体生命的尊严。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突围”困境，当论证中国方案遭遇“特殊性”与“普适性”的二元诘难时，全球南方的实践给了我破局的钥匙——独创“情境化普遍主义”方法论，将本土治理经验拆解为可迁移的“价值—工具—场景”三阶模型，在非洲数字身份系统、拉美开源AI社区的验证中，见证“发展权优先”的原则如何超越文化差异，成为反抗技术霸权的共同语言。这种“从特殊到普遍”的跃迁，印证了全球南方经验的世界意义：它不是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多元文明共生的活态样本。

面对“思想实验的伦理边界”，将生命权、自由权等核心领域划为“人类终审”的禁区。这个方案意外获得广泛认可，更让我彻悟AI治理的核心要义：秩序的最高境界不是完美控制，而是动态平衡。如同全球南方的农耕智慧，既接纳新技术改良种子，又守护土地与传统的根系。

这场跋涉的终点，是学会以全球南方的眼睛看世界：技术不是悬在头顶的利剑，而是握在手中的犁铧，唯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犁头，以“多元文明共生”为田垄，才能在智能时代的土地上，耕耘出属于所有生命的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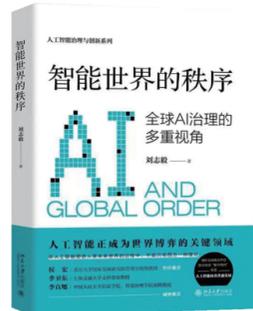
传统智慧与新兴技术的握手

书稿付梓之际，回望写作历程，最珍贵的收获并非预设的结论，而是在智能技术迭代与全球治理变局中始终保持对根本问题的凝视勇气——这种勇气源于对“秩序何以可能”的持续叩问，它让思想的航船在未知海域中既不盲从风浪，也不固守港湾。

我们看到一些学者提出“新型技术依赖”的观点，质疑“数字发展权”的实践风险，恰似航程中触到的暗礁，提醒理论之树必须如红树林根系般深扎全球南方的土壤，在“发展”与“自主”的张力中生长出韧性；而某些国家以AI伦理政治化的倾向割裂共识，则如迷雾中的假灯塔，迫使我们探索“重叠共识”的构建路径——在文明差异中寻找价值公约数，如同在星空中辨认共同的北极星。这些未竟之业并非遗憾，而是智能文明探索的常态，它们将指引后续研究：我正在撰写的《空间智能与治理革命》将以四维建模为桨，探索跨境水资源争端仲裁中“空间正义”的量化实现；酝酿中的《意识的机器镜像与治理伦理》则尝试以神经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对话为罗盘，建立人机意识共存的伦理框架。这些探索如同散落在智能文明夜空的星火，虽各自微弱，却终将在多元共生的引力下指引方向。

掩卷沉思，书中反复出现的隐喻愈发清晰：人类文明恰如在湍急河流中航行的独木舟，智能技术是推舟我们前行的浪潮，时而温柔托举，时而狂暴冲击，而秩序则是掌舵者的智慧——它既需

顺应浪潮的节奏，更要在暗礁与漩涡前校准航向。当非洲农民用手机接收AI生成的气象预警、拉美学生在开源平台上自学AI课程、东南亚工人在数字技能培训中重获职业尊严时，这些全球南方的实践正以千万支笔共同书写新的航行日志：它们记录着技术如何从“霸权工具”转化为“赋权杠杆”，从“单一叙事”走向“多元共生”。这本《智能世界的秩序》不过是日志中的一页，却承载着深深的期许：愿人类在驾驭智能浪潮时，以全球南方为镜，照见技术霸权的盲区——那里有被忽视的文化多样性、被遮蔽的发展权、被遗忘的脆弱者；更愿我们以多元共生的智慧为舵，永不忘文明航程的初心。正如马塞尔老人所言：“星象与数字共判雨季，方得丰收。”智能文明的未来，亦需在传统智慧与新兴技术的握手言和声中，驶向更辽阔的彼岸。



《智能世界的秩序》
刘志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冰封的世界，沸腾的求知

也各有性情与执念：迪尔维尔为事业搁置家庭，罗斯为捍卫爱情争取荣誉，威尔克斯不算专业却果决近乎专断。他们的探险，既是探索自然的未知，也是与自身个性、欲望相处乃至对抗的过程。

如今人们在南极地图上看到的罗斯冰架、罗斯岛、罗斯海，及法国科考站“迪蒙·迪尔维尔站”，都铭刻着他们的贡献。作者认为，罗斯冰架是19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地理发现，而这正是那场跨国竞赛促成的集体成就。只不过，这些成就的取得极为曲折。《极地竞赛》真实还原了探险队的遭遇：他们常有措手不及的狼狈、难以招架的困境，却也偶有邀天之幸。

作者交错叙述三支探险队的进展，读者仿佛随船同行，沿途新奇景象令人目不暇接。作者文笔生动，比如形容企鹅像穿着双色裤子的迷你士兵，眼周一圈白毛的阿德利企鹅看上去像戴眼镜的长绅士，鲸鱼吞食海藻如同牧场上的牛群吃草，威尔克斯探险队的“救济”号则因不堪使用，被比作一只造价昂贵的蛞蝓。

当然，这趟发现之旅并未停留在表面见闻。如何在极端环境中一步步揭开科学的面纱，这一过程最具震撼力。正如作者所言，三支探险队留下的宝贵财富“不在于为某个国家赢得了荣誉，而在于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共

同承诺”。罗斯探险队中的植物学家胡克，在凯尔盖朗岛发现了多种在严寒中顽强生长的极地植物。此后数年的研究中，现代生物地理学由此萌芽——他发现凯尔盖朗岛的植物区系与火地岛的亲缘关系，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近。迪蒙·迪尔维尔则留下了重要的人类学观察，最早系统记录了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南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差异。他笔下对巴塔哥尼亚人的描述，仅凭着这些人能在极寒地带生存，便令人心生敬仰。

罗斯在南极之旅中开展了系统的地质观测，这得益于他与爱德华·萨宾的持续交流，也揭示了近代极地科考与全球地磁研究的内在关联。“帝国领土与新科学是同步延伸的”，英国王室希望在南极建立观测站，便是明证。另一本南极主题著作《南极洲：一片神秘的大陆》也提到，科研有时充当了领土声索的“占位符”。作者在章节末尾梳理了他们对地球物理学的贡献：爱德华·萨宾汇总了数十万次磁力读数，依靠一支陆军文员团队完成繁复计算，却并未找到期待中的规律。幸运的是，他从资料中了解到，德国人施瓦布同样执着地记录太阳黑子活动。萨宾将太阳黑子活动峰值与地磁异常联系起来，一切忽然有了意义。萨宾看似徒劳的坚持，虽偏离了既定目标，却带来了意外的洞见。

作为一片科研圣地，讲述南极探险

必然绕不开科学知识。该书在每一章末尾适时补充相关知识，有着恰到好处的心思。比如从威尔克斯探险队的“海鸥”号及其“风暴海燕”的绰号，延伸到鸟类飞行的奥秘：鸟类飞行速度与能量消耗构成U形曲线，拥有能耗最小、飞行最远两种最优速度，并能快速切换；信天翁的扇形肌腱这一生物构造优势，让它在狂风中也不易折翼；飞行时，它还能借助海浪抬升气流，运用空气动力学在高速飞行中能倾斜，将多余动能转化为势能。谁能想到，海鸟御风而行的优雅，本质是对自然的极致适应？

作者还适时引入“地球空心说”的知识。美国人西姆斯主张探索两极之洞，其支持者麦克布莱德著书《西姆斯的同心球理论》，论证地球是空心的，两极完全敞开。另一位支持者雷诺兹则投身游说，最终推动美国国会通过组建南极探险队的法案。他还获得了作家爱伦·坡的支持，后者写下《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同样基于这一在今天看来错误的假说。毋庸置疑，大胆想象并非坏事，它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力。

细究起来，“南极”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南极老人星”见于《史记·天官书》：“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不过，天文上的南极与地理南极并非一回事：南天极是地球自转轴向外延伸在天球的交点，地理南极则是地轴与地球表

面相交的南端。

中文世界很早就有关于南极探险的介绍。据邹振环统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40篇介绍西方地理学的文章中，涉及南极探险与地理考察的有3篇。其中，1833年8月“新闻”栏曾综合报道：“夫大英及法兰西等国，多有船只到南北冰洋，为勘察新地。乃因南边多遇冰块成为大山，不破船，是故以先未有察悉。兹去年有船一只游弋南洋，露出一个大洲。居在亚非利加及亚利加二大洲之南也。可惜其地只见有等鸟，名为大风鸟者（指企鹅），此外无何生物，亦无果蔬可食。想该地极寒，恐种谷麦亦不生也。”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学会社印行的《冰山雪海》，是中国第一部涉及南极探险的科幻小说。华侨黄大郎、田八郎、潘九郎、李二郎从印度洋“巫来由”归国，有感于国家贫弱，筹备15艘船、男女共12983人，从泉州出发前往两极考察，希望“别寻一块洪荒未见之大陆”。发现北极不适宜生存后，他们转往南极，试图建立大同社会。几个发起者的名字颇有唐风，采用排行制，按照钱航先生的说法，这既是姓名文化中的实名敬避现象，也是对血缘关系的拟制。耐人寻味的是，这本小说里登陆南极的诸国志士，多来自当时被视为弱国的群体。受维也纳体系影响，时人常有“上中下三等之国”的划分，而南

极在当时已是列强竞速之地。

《冰山雪海》诞生的年代，正是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1897年比利时探险队启程，此后共有10个国家的17支探险队先后奔赴南极。1912年1月，英国一支五人小队抵达南极点，可惜已落后于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后者已于1911年12月14日率先抵达，并留下了作为标志的帐篷。英国人的合影，只能屈辱地站在挪威帐篷前。这支英国探险队的结局令人唏嘘：埃德加·埃文斯在摔倒后离世，劳伦斯·奥茨拖着坏疽的腿走进暴风雪中再未归来，亨利·鲍尔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与爱德华·威尔逊最终冻毙在罗斯冰架上的帐篷里。斯科特留下的日记写道：“我并不后悔这次旅程，它表明英国人可以承受苦难。”

回到现实，南极早已不再是无人之境。1961年6月23日，《南极条约》正式生效，规定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保障科学考察自由，促进国际科研合作。这片曾承载人类征服欲与求知欲的冰封大陆，如今依旧是地球上最纯净的科学圣地，在皑皑冰雪之下，继续见证着人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永恒征程。

《极地竞赛：19世纪南极开发史》
[澳]吉伦·达西·伍德 著
赵昱辉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